

DIE ZUKUNFT DES KAPITALISMUS

VON

WERNER SOMBART

UEBERSETZT VON

DIPLOMVOLKSWIRT DR. CHANG LIANG JEN

資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附譯者著

宋巴特經濟學說之地位及其體系
宋巴特之計劃經濟觀

的將來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十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五月增訂再版

張

資本主義的將來一冊

(33502.1)

Die Zukunft des Kapitalismus

每冊定價大洋壹元貳角

外埠酌加運費

一元二角

原著者

Werner Sombart

譯述者

張樑任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版 翻
權 印
所 必
有 究

再版序

本書再版之距初版，爲期僅一年二三月。這樣一個專門問題，在貧窮兼不景氣的中國現狀下，能在比較短促時期內得能再版，譯者感到萬分欣慰，這當然要歸功著者聲望之隆重，思想之精密和觀察的準確了。宋氏原文，風行德國，報章雜誌，無不有其美評，以下諸端，僅其數例：（註A）

「……該書雖非小說，然文筆之緊張有如小說」（福蘭府報 Frankfurtur Zeitung）

「……如欲對該問題欲發表意見，敢請細心讀宋氏之小冊」（德國經濟家雜誌 der Deutsche Oekonomist, Berlin）

「……宋氏於薄薄四十八頁中較平常所謂之大著作說得更多」（德國輿論 Deutsche Rundschau）

「……每讀宋氏之書，感覺無限之趣味，以其精密之思想能與敘述之淺顯合而爲一也……」（全德報 Alldeutsche Blätter）

「……各種現在與今後之困難，於宋巴特之簡短而豐富內容之演說詞中，明顯討論」（普魯士年報 Preussische Jahrbücher）

「……總括言之，該書係一豐富材料之小冊」(Brockdorff 博士在法國日報 Deutsche Zeitung 之批評)

「……此權威之作家，討論今日之經濟紊亂問題，指出各種進入光明之道路，讀之誠覺趣味無窮也」(羅采侖日報 Luzerner Tageblatt)

「……欣幸該書價值低廉，人人可得購讀，文字雖少，然我人切身之根本問題，以宋巴特素有之深刻筆墨，揮發無遺」(人民保守報 Volkskonservative Stimmen)

再版時適執事滬上，事務蠅集，雖將初版校閱一過，然仍嫌匆促，未能逐字逐句精敲為憾。疏忽之處，自知難免，諸希見諒。又原文後附「宋巴特之計劃經濟觀」一文，曾刊於東方三十一卷第一號，係原文之精華及札要，如讀者繼原文後再讀此篇，當更明瞭宋氏之思想。再版時蒙余生唐正邦許彥賢二先生襄助，謹此申謝。

註 A. 報評見宋氏「德國社會主義」(Deutscher Sozialismus)末頁

張樑任一九三五年一月滬濱。

宋巴特經濟學說之地位及其體系（代序）

張樑任

今日經濟上及政治上最爭執的問題，莫過於資本主義的將來。資本主義將崩潰抑將繼續存在，這值得我們注意探究的。近年來層出不窮的經濟著作，大半與此問題有關；換句話說，沒有這個問題的爭執，經濟書庫，必無今日之豐富。即政治上，亦因為這問題之難以解決而有黨爭之激烈化，致引起社會的紛擾。

如此被人注意而久經學者研究的問題，何以還留爲人們爭執的對象呢？原因固然很多，但爭執者之不全由公平的學理的立場出發，而多少被政見或成見所支配，亦爲原因之一。即經濟學者中，亦竟有不盡秉公運用研究方法或歷史事實，平心靜氣地洞燭資本主義之所以發展及其勢力之消長者。負有盛譽的維納宋巴特氏（*Werner Sombart*），鑒學術界之紊亂，時代之要求，毅然以研究資本主義之前因後果爲己任，費了十餘年之功力，成近代資本主義之巨著（*Der moderne Kapitalismus*）。迄於今日，凡是經濟學的學徒，置爲案頭必要的文獻。本巨著，共六大冊，前二冊名爲「前資本主義經濟」（*Die vorkapitalistische Wirtschaft*），中二冊名爲「初期資本主義」（*Der Frühkapitalismus*），後二冊名爲「盛期資本主義」（*Der Hochkapitalismus*），舉凡關於資本主義的一切問題，無不詳加研究。於此範圍中之書籍，宋氏巨著，首屈一指。

此書雖係名著，然不易普遍。一因讀者忙於事務，時間所限，無暇盡讀；二因書價昂貴，非人人所能購置。宋氏有鑒於此，久欲將其思想大概繕成小冊，供給有上述困難的好學之士。一九三二年，適作者被邀於德國有名的「幣制信用經濟研究會」(Studiengesellschaft für Geld- und Kreditwirtschaft)演講資本主義之將來，歸後再加整理，刊成小冊。一時購讀者踴躍異常，一月中易數版，開學術界中罕有的先例，蓋此書雖係小冊，然可代表宋氏學說之體系的概觀，謂爲宋氏巨著之縮影，不爲不當。

譯者受教於柏林大學，聆宋氏之講學凡七年，且親聞宋氏之資本主義之將來的演講，覺其內容謹飭，意見有獨到之處，故譯之以供國人。惟宋氏小冊，究係由講演稿整理而成，因講演時間之有限制，僅能將其整個思想之重要者，以最少最簡括的文字敘述，故字字含有重大意義，含有無數之思想因子，小小的冊子，簡直總括宋氏所代表的整個意見。(註一)故對於從未讀過宋氏著作或尙未了解其整個思想者，於讀此「資本主義的將來」時，不無困難。此所以譯者於原文之前冠以長文介紹宋氏之經濟學說及其思想之大概。

A. 宋巴特經濟學說之地位

很值得我們注意的問題是：宋巴特的經濟學說屬於那一派呢？曰屬歷史派。所謂歷史派者，係反對自然學說而起，其基本思想，在反對經濟法則的絕對性和無時間性，主張經濟組織之相對性。換言之，經濟全恃人類發展程

度而定的，故論理和政治是經濟思想的基礎。

歷史派前接正統派，後聯界限效用派，居這二者之間，對經濟學有重大的貢獻，就研究方法言，正統派主演繹，歷史派主歸納，界限效用學說又主演繹，一反一覆，如物極之必反。

歷史派勃興於德國，係反對正統派之學說而起，其所以能勃起，非無當時的背景，正如正統派以前之重農學說反對重商學說，亦有背景相同。重商政策盛行於十七八世紀間。當時因經濟組織之顛覆，故希臘哲學家代表之倫理的，輕忽財富的觀念漸被淘汰，而代之以謀財富爲目的之思。於是研究致富之道的人們，日甚一日，即國家亦以謀人民達到富庶爲任務。至此經濟踏入政治之範圍內，非復如中古時代經濟僅於倫理或道德範圍內被人注意可比。這樣看來，中古時的經濟，是一倫理問題，十六世紀以後，變爲一政治問題，現在經濟學中的經濟政策即基源於此。

這個趨勢，有牠的背景。當時國家主義思想勃興，政治上非謀統一不可，無中央集權，不能安內而攘外。可是祇靠國家統一尚不夠，還要經濟獨立，故須求一經濟統一的國家。於是有交通的發展，生產的保護，以及實業的獎勵了。故當時經濟力得以發展與促進，不無受國家冀圖中央集權及增加稅收之影響耳。（註二）

所以重商主義不再注意道德的原子，而企求國家權力的鞏固。欲求實現，必須有富豐之稅收及人民之富庶。所以一國經濟力的發展，如工商業之促進，是亟不容緩的事實。重商主義以金錢來代表財富，以爲黃金愈多，國家

即愈富。等到國家所有的錢財羅掘無餘，然後進一步向外貿易，換取錢財，所以有利的商業決算，即輸出超過輸入，無怪成爲當時的一般企求。以上一切，實在是基於企求國家權力之鞏固，經濟之富裕，而演繹出來的政策罷了。重商主義認經濟爲國家的生活表現，經濟與國家生活有密切的關係，這點已在當時被人認識，是比較以前進步的地方，但當時經濟之，尙附庸於政治，也是不能否認的事實。

觀夫基督教被道德及倫理觀念所支配而倡公道價格及禁止利息，則促進富財的人民，爲逐利而去探討價格造成的原子和貨幣的本質，自無足怪。重商主義後期的經濟學者，對價值、價格、貨幣、利息、對外貿易及生產，曾作深切的研究，於是經濟狀況的碎瑣智識，漸漸成爲一真實的科學了。理論經濟學，就發軔於此。

可是重商主義探究經濟生活的變化，雖科學的探討尙遠啊！要發展經濟學成一獨立的科學，非找到一個統一的觀點不可，然後將各種經濟問題依此而分類。重農派的始祖克內（Quesnay）（註三）居然做到這點，他所看到的觀點是滿足慾望的根本事實，在這個觀點下，經濟問題成一好像有機體的系统了。

除此以外，克內尙有其他的功績：他認識經濟生活被牠內部發生的法則所支配。克內以爲自然和社會，均是神造秩序所發出來的，而這神造的秩序，卻早已有牠的法則。這樣，克內對這新科學，有了一定的目的：探究國民經濟學的法則。

克內及其信徒以原始的，基因於事物本質內的聯繫爲「自然秩序」，亦即國民經濟之健康狀態，他們以人

力干涉爲反自然秩序。這派因企求及贊助經濟的自然基礎，尤其偏護農務，所以命名爲重農主義 (Physiocratism)。(註四)

重農派不能滿足於討論單個經濟問題，也沒有興趣在政治問題中討論經濟問題。他們所渴望的是對經濟生活造成一個有系統的統一的組織，造成一種科學，與自然科學相並。該派得哲學的，尤其是自然權利 (Naturalrecht) 的激勵，便努力研究經濟生活。正與研究這個自然生得之權利一樣。經濟生活的自然聯繫及自然狀況，爲這個新科學的對象。所以這個科學，起初就是哲學的科學，視爲社會哲學的一部份。這個科學可以說是介於自然哲學與社會科學之間，爲這二者的連節。

重農主義學派欲以經濟學與自然科學連結，故以滿足慾望及取得滿足慾望之物件爲自然事實。因之他們一方特別注重這產生滿足慾望之物件的農業，他方主張國家竭力免去干涉的經濟生活，俾經濟生自由轉動。經濟學派的第一派，雖由克內成立，然而被後世推尊爲經濟學之鼻祖，卻不是他而是創造正統派的亞當斯密 (Adam Smith 1723-1790)。這是因爲亞當斯密能夠在哲學的基礎上，給我們一個廣闊的，從統一的觀點上計劃的系統，這個系統，較重農學派抽象的學說，較爲實際。

他和他的信徒同意於經濟生活的自然學說，亞當斯密對經濟學之基礎與重農主義派同樣，由經濟生活發出來的法則應當研討，經濟生活的種種，應當認識。正統派和重農學派所不同者，是前者改變後者之對財富來

源的片面觀察。正統派發源於資本主義的英國，決非無因，重農派對農業片面的贊美，與英國的事實相矛盾。煙霧迷茫的工廠煙筒予英國以財富，此非農業所可能。因此人力及資本的意義，於英國特別被人注意，較發生於法國的重農派被人重視得多了。觀於亞當斯密的著作（註五）第一句謂財富的基礎係勞工，就可知道他注意勞工的一斑了。除外，亞氏屬蘇格蘭道德哲學派，故不能同意於重農派的任意放棄倫理的原子。

亞當斯密經濟學的廣大基礎，卻不能垂久。以演繹法研究著名之李嘉圖（David Ricardo 1772-1823）就大大地縮小了亞氏的範圍。（註六）他屏去一切關於道德哲學的原子，而把國民經濟學作為經濟生活的純粹自然學說。李氏僅以人們的來往交換經濟及由自私盈利原則所發出的現象，為國民經濟的內容。這是李氏及其信徒的優點，同時也是缺點。就優點方面說，李氏將這個新科學予以統一化，就缺點方面說，李氏不能解釋複雜的經濟生活，像這樣科學未免太抽象，與牠所要解釋的真實生活，相距太遠了。

重農派所討論的材料，再由正宗派擴大或增加，不久即成一科學的系統了。牠由價值與價格學說，貨幣學及分配學，生產學與消費學而成的。然而科學不僅是混沌的認識，卻是有條理的知識。所以在這方面所得的功績，誰都不應抹煞。不過亞當斯密和李嘉圖沒有將國民經濟學成一完全的系統，其成就，待諸後日之裴氏（Jean Baptiste Say 1767-1832）（註七）及穆勒約翰（John Stuart Mill 1806-1873）（註八）二者。

據上所說，則亞當斯密、李嘉圖及其後起者們，倘以正統派名字來包括，似太含混。不過這派的人，有他們共同

之點。尤其是個人主義的特色，這是由重農主義的自然科學之思想方法而來的，因這個個人主義的特色，使人們以經濟當作個人的現象。經濟的社會方面，他們當作個人力量相互作用的結果。受資本主義訓練的英國人，以求利代替這重農派所認識的慾望滿足，正統派以求利為經濟生活之原動力，牠施其作用於供求相遇之市場上。自由競爭視作管理的原則，牠固然並不被否認為社會的現象，卻視作個人求利的效用。同樣是分工。在其他方面，亞當斯密及其直接的信徒，如馬爾薩斯（註九）袁氏、雅各伯（Jacob）等一流人物，和李嘉圖及其信徒，尤其是穆勒雅各（James Mill）（註十）及麥可洛（MacCulloch）之間，有不少的異點。前一支帶倫理及歷史色彩，而李嘉圖及其信徒嚴格地繼續建築國民經濟學的自然學說。我們須記著，離事實太遠的李嘉圖的抽象學說，不久亦受限制。袁堯（Senior）（註十一）凱爾納思（Cairnes）（註十二）及穆勒約翰不同意學說的太抽象化，而後者因顧到各方面的現象，故已頗接近亞當斯密的立場了。正統派的代表者只有在政治要求中，在企求經濟自由中，彼此表示一致。

這個由重農主義創立而由正統派發揚的學說，把國民經濟學的研究對象獨立了。這個成功，不是沒有代價的：因為經濟生活不是單獨地被觀察的，卻是附屬在人類和社會的單位內，假使我們要單獨觀察這個經濟生活，那末非引用經濟行為的單獨方法（Isolierungsmethode）不可。因此正統派有「經濟人」（homo oeconomicus）的構成。

可是「經濟人」僅是虛空的形狀，非實際可捉摸的。「經濟人」要表示人類一切行為，只被逐利所支配。倘使正統派始終明白「經濟人」僅是理論的構造，那並沒有什麼弊病。但是正統派的學徒常常忘卻這點，而由「經濟人」所得的推斷，無條件地直接應用於實際生活，好像人們真是僅僅追逐盈利而已。

即正統派中之穆勒約翰，對該派的經濟法則之無時間性，亦生懷疑。他以為在生產方面，固然有永久法則，可是在分配方面是沒有的，因為經濟生活常被社會變化所影響。

在以前，人們於倫理及政治範圍內去觀察經濟，到了正統派，經濟生活，因學理化之故，全由這些範圍內解放了出來，且由人類及社會連關上抽拔出來。無怪這種觀察的結果不合於事實的真相了。

因此生出反對這經濟生活的自然學說之各派了。第一派是倫理學派（*ethische Schule*），由西斯蒙提（*Simonde de Sismondi* 1773-1842）（註十三）所成立。西氏在一八一九年出版的著作，責備李嘉圖，謂在「經濟人」基礎上建築的經濟學，不過是一種商人經濟學，而忽略了人類社會的道德。西氏的倫理派乃為後日社會政策的出發點。

反響正宗派自然學說之第二派為科學的社會主義。這派與正宗派的相異點，不在理論方面；如這派的陸排（*Reich*）（註十四）馬克思（*Heinrich Karl Marx* 1818-1883）拉薩爾（*Ferdinand Lassalle* 1825-1864）（註十五）卻都站在正宗派的學說上，尤其李嘉圖的學說上，而以李氏的學說為資本主義經濟秩序的

寫真。不過一到他們手裏，「經濟人」和倫理要求的衝突，作爲反對現在社會秩序的理由了。馬克思以爲資本主義發展之中，帶着社會主義的種子，牠越向前發展，社會主義的實現期越近，牠發展到極度，也就是牠的崩潰，同時也是社會主義的擡頭。資本主義經企業集中（集中學說 *Konzentrationstheorie*），固定資本增加，工人失業（工業常備軍）羣衆之無產化（貧困化學說 *Verelendungstheorie*），危機式的擾亂到資本主義的崩潰而達社會主義的勝利。

不特因正統派的道德觀點和個人主義引起反響，正統派將經濟與社會其他的生活表現分開以及主張世界主義的二點，引起浪漫派領袖米勒（*Adam Müller 1779-1829*）及國家主義的李士特（*Friedrich List 1789-1846*）所反對。米勒係德人，受德國的理想主義哲學的感化，而正是這個哲學與正統派頗不相容，米勒的著作（註十六）係浪漫哲學的產物，反對正宗派以自然權利的觀察法。去觀察經濟生活，他卻以經濟生活爲社會生活整個之一部；而李士特（註十七）則以爲正宗派談世界主義，不切合一國狀況。在某種觀點看來，米勒尤其是李士特帶了歷史派的色彩，所以大半的經濟思想史中，常把他們當作歷史派的先鋒。

這反對正宗派自然學說的歷史派，不僅將倫理觀念重新導入國民經濟中，同時還反對正統派的不注意歷史事實。所以歷史派的成立，由於不滿意正宗派的不顧慮道德、國家及歷史事實等諸原子。歷史派除顧慮到以上的原子外，還反對經濟法則的絕對性和無時間性，而主張經濟組織之相對性。倫理和政治，歷史派又拿來當作國

民經濟學的基礎了。

陸隲 (Wilhelm Roscher 1817-1897) (註十八) 係歷史派舊支的創造者，他並不要擯棄正宗派學說，祇願以歷史材料去補充牠。他並不否認經濟學法則，但是相信要明白現在必先了解過去。到了希爾勃郎 (Bruno Hildebrand 1812-1871) (註十九) 與克尼斯 (Karl Knies 1821-1898) (註二十) 這派反對經濟法則之無時間性，而以探究經濟的發展法則爲己任。至於歷史派的新支，則由許模勒 (Gustav Schmoller) (註二十一) 所創造，他說歷史派新系與舊系的不同，在於新系不願馬上就一般化，而感覺有根據材料和事實之搜集，作特別研究單個時期，單個經濟狀況之必要 (註二十二)。然而這兩系的根本思想，還是相同。

探討的精神，並不停頓着。正宗派因理論的努力而太抽象了，所以又生出反響的各派。歷史派對於經濟政策，有許多貢獻，因爲他們將社會其他的原子，如民族的意識，倫理的顧慮，政治的基礎等，都歸入國民經濟學內。可是牠僅有歷史上的敘述或倫理上的探索，不能滿足一度引起的經濟法則的探究之興趣。

在英、法，奧都感着這個需要。傑洪斯 (William Stanley Jevons 1835-1882) (註二十三) 瓦爾拉 (Marie Esprit Leon Walras 1854-1910) (註二十四) 及孟格 (Karl Menger 1840-1921) (註二十五) 審察正宗派的出發點，一方面在與「缺乏」概念有關的經濟量的原子上；他方面在個人主觀的經濟決斷上建築了一個新的理論系統，包括這二個原子的概念，仍爲「界限效用」，牠作爲重以理論探究的二學派之基礎。第一派是數學派，

也名洛桑派，（註二十）以爲經濟的根本法則，在於經濟均衡，而以——因爲是量的問題——數學工具去探討。界限效用學說的第二派偏向心理原子方面，係由維也納學者所創造，故名之爲奧國派或維也納派。（註二十七）

這新的界限效用派，好像把正宗派學說完全擯棄，我們如果加以深密考慮後，即知不然。馬夏爾（Alfred Marshall 1842-1924）合這二派的學說，把傑洪斯和正宗派的結果，吞納於他的系統中。他的學說又發展爲劍橋派，這派很趨向於數學方法。

與正宗派國民經濟學一樣，界限效用派也探究國民經濟的聯繫，敘明價值和交換現象。牠要達到這個目的，也用單獨方法，也建築於「經濟人」的抽象上。這樣界限效用學說，也成了純粹經濟學，與克內及李嘉圖代表之系統相同，不過更有意識些罷了。正統派之其他的前提，如市場的統一性，貨幣量與價格的聯繫等，於界限效用說內更深刻地敘述，因爲牠也探究一個理想市場，拿這個理想市場來指示真實市場的趨勢。該派與正統派的異點，最重要的是在價值學說範圍內，將價值的主觀性質特別指出，因此頗有影響於奧國派的價格學說和分配學說。但是市場，價格造成及分配問題始終爲界限效用學說（註二十八）的主要問題，正與正統派一樣。

當界限效用說剛起始的時候，德國歷史派正蓬勃猛派，向孟格進攻。（傑洪斯和瓦爾拉尚未被週知）許模勒反駁孟格的學說，因此發生方法爭執，孟格在他的著作內將社會學的方法詳細討論，證明歷史和倫理的探討不能代替單獨的方法。許模勒及其信徒堅決地反對後者，而孟格及瓦爾拉從未否認過歷史和倫理的觀察法之

有價值，卻認牠爲經濟政策的出發點。（註二十九）

經濟學並不因此而息止爭執，米勒和西斯蒙提所懷疑之由單獨方法所得結果的可用性，並不消沉下去。許多人以為無論那種經濟的觀察法，只要牠由社會生活的整個上挖出來，決不會真實，因為牠根據由社會中抽出來的個人之行爲，確定這國民經濟的現象。所以由此而所得的理論，被認爲原子主義（Atomismus）和個人主義了。這派的人以為國民經濟的本質，不能從個人主義方面來認識，因為這正是整個經濟的一部。經濟是一個合目的的組織，一個行爲的系統，這些行爲的基礎，不在個人的動機，而在整個的次序相依而成的制度上。所以經濟的本質在於整個內的，不是因果的觀察法，卻是合目的的探究，才是正當。

代表這整體派（Universalistische Schule）的，是斯派（Spann）（註三十）。這派固然與歷史派及其相鄰的諸派有接解之點，但決不是忽視理論，卻是由目的論的立場上，將理論從新建造起來。

在德國，因不滿意以前的學說，而有觀照學說的成立（anschauliche Thorie）。牠並不從事於國民經濟內部分的因果聯繫，而求了解本質，了解統一的整個。因為整個祇能在歷史的事實中找求，所以牠很偏向歷史方面的。

自來的經濟思想，我們總算大概地敘述了。十九世紀的經濟學遺給二十世紀的，有三大爭執：在方法學上，有歸納與演繹之爭，前者以為經濟科學的任務，先在尋找經濟歷史的材料，然後再讀理論，在歷史材料未找夠以前，